

河南省
开封市电影志

(征求意见稿)

下

开封市电影志编辑室
一九八九年一月

第一节·报刊专栏

最早的一篇影评

开封初期电影活动，除商品赢利，多以娱乐为目的。因此只求影片新奇与否。

当电影在开封出现的时候，作为一件新奇事物，因人们的经济地位、文化素养、欣赏水平异同，必然产生种种褒贬。这种褒贬，便是最早的电影评论，但由于当时片子缺少，观众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

1916年10月，天津象记百代电影公司带着一批影片来汴。在这之前，该公司曾数次来汴映出，皆因影片不足而失败。而这次来汴，仍未能受到欢迎，10月24日《天中日报》以《电影戏势难持久》为题，发出评论。文章说：“电影戏此次所办，各片仍系旧片，模糊不真，电力不足，最易伤眼。稍有可注目者，每晚间有一、二片，以致营业颇形冷落，每晚售票多不敷开销。”文章接着对影院的服务态度提出了批评，说：“有售票者，假情询私与收票后重收之弊。”并列举事实说明某人购票观戏，收票者经过检验将票收去旋又来收，于是某人大怒，双方引起争吵，最后不得不报“捐委会”委员朱某人出面，经过“再三调停，方始了结”。这是开封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电影评论。

当时电影的制片、放映技术都比较简单。影片多系无声故事片，每片放映十几分钟完毕，因为票价昂贵，观众对象多半都是上流社会的有钱人。而这些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象似食客进饭馆就餐一

样，首先注意到的是每盘菜的色香味美，尔后才是食品的营养价值。因此，对影片要求，完全是以消遣和娱乐为目的。而对影片的优劣评论，也首先是能否看清，是否好看为标准，极少有人去注意它的思想内容，社会效果问题。

左翼电影运动

电影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向人民群众灌输些什么，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是三十年左翼电影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中心问题。形势波及全国。

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在领导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的同时，十分注意电影这一阵地。1931年9月，左翼剧联通过了《最近行动纲领——在现阶级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这个纲领共六条，其中三条专门讲到电影。纲领旗帜鲜明、内容充实，十分清楚地规定了“左翼戏剧和左翼电影应当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描写无产阶级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出路，提出了理论战线的建设和对各种反动戏剧电影理论及其作品的斗争的任务。”

在《最近行动 纲领》提出之前，1930年1月，鲁迅先生曾翻译了日本左翼电影评论家岩崎昶的《电影和资本主义》一书中的《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部份，并写了“译书附记”，尖锐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反动影片的侵略和麻醉性质。鲁迅说这些影片“运入中国的目的”，“只如将陈旧枪炮，卖给武人一样”，要“多吸收一些金钱而已”。同时指出在“冥冥中”这些影片所产生

的“功效”是：“看见他们勇壮武侠的战争巨片，不意中也会觉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看见他们‘非常风情浪漫’的爱情巨片，便觉得太太如此‘肉感’。真没法子办——自惭形秽”。对于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鲁迅先生明确指出，他们用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糊涂”，以达到“其令人糊涂的教化。”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时蒋介石正准备向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对日本则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不到三个月，中国东北全部沦陷，接着1932年日本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暴发了上海的抗日战争，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随着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中国的广大电影观众，对电影界的状况提出了“猛醒救国”的忠告。要求多拍摄放映一些宣传抗日救国的好影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左翼电影运动，有很多宣传抗日的影片，如《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暴日祸沪记》、《上海浩劫记》、《十九路军光荣史》、《上海抗敌血战史》等等，都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拍摄出来在各地放映的。这些影片上映后，受到全国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但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态度相反，国民党政府对宣传抗日救国的影片，却在各处泛滥无阻。这样就激起了中国最广大观众的强烈不满。

1934年11月11日，一署名亚群的人，在《河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电影之现在观》的文章，开首说：“近年来中国电影是进步了，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同时中国观众也是飞速的

进步……这二者中间，显然有一种比重，即是说后者比前者进步快。”

文章认为，中国观众，特别是小市民阶层，对于电影作家有着强烈的要求。即就是“要求电影作家反应目前社会的真实，当他们给残酷的现实毁灭了往日之幻梦的时候，他们希望在电影中得着对于自身苦闷的解决办法……”文章例举了观众喜欢的影片。如《人道》、《狂流》、《春蚕》、《小玩意》、《渔光曲》、《人生》、《中国海的怒潮》、《盐潮》、《暴雨梨花》、《风》、《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母性之光》等。尤其是《渔光曲》，打破世界片的卖座记录。

上述这些影片，大都是左翼电影工作者，在同国民党斗争的逆境中拍摄出来的，只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真切的反映了社会的现实，代表了广大观众的愿望。

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呢？文章明确指出：“一面欧罗巴之旗在广东插入了中国领土之后，直到现在为止，从经济侵略而瓜分中国是极明白的事实表现，因之决定了中国的两条道路：做亡国奴乎？反帝乎？何去何从？不允许我们丝毫犹豫。那末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就只有彻底的反帝。换句话说，不愿死就得誓死奋斗。”文章最后大声疾呼，当前中国观众最需要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迷信的影片。

1934年12月11日，署名海荣的也在《河南民报》发表题为《作为教育手段的中国电影》的文章，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以及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封建迷信和文言文的复活，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疯狂进攻。指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争取独立解放的必要性。文章特别强调地指出，电影不能只是娱乐品，它应该

“是文化运动的一翼”，电影的任务是“非把民众的独立解放视为最高利益，非负担起为中国民众的独立解放而奋斗的任务不可的。”

文章最后，对过去中国电影为民族独立解放所做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然现实“客观条件的打击与困难”，却是“一天天加重”，这正说明，中国电影若要担当起应负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为“打破这些困难”，作不懈地努力和斗争，而决不是投降。“假如有人拿这个困难来淆惑人心，这个人就是汉奸。”对于中国电影未来发展前途，文章旗帜鲜明，充满信心地说：“不管一切汉奸的反对，中国电影是必须而且一定胜利的，负起教育民众反帝反封建反宗教迷信的任务的。”

对舶来品的抵制

影片《人兽奇观》，由美国米高梅公司摄制。是三十年代初美国有声野兽片的开山鼻祖。其历史背景，正是美国种族歧视，国内周期性经济危机，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高潮时期。

影片于1933年来到开封。是年二月份，华光电影院购来有声放映机，改默片为有声片，2月18日开幕，首映此片。放映之前，在报纸上和社会上对影片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被奉为空前绝后的无价之宝，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杰作。

《人兽奇观》描写的是非洲荒漠，“兽吃兽、兽也吃黑人，黑人也吃黑人”，而白人到了那里“被惊为天神，尊为女王”的景象。影片到底宣扬了什么？社会效果怎样？上映之后，一位署名席猛的

人，在《河南民报》上发表文章，对该片提出了严肃而深刻的批判。文章指出，过去的一年是帝国主义经济周期恐慌的一年、“工人失业，银行倒闭”，这时帝国主义“到蛮荒的地方开拓殖民地，是他所希冀的唯一的续命汤”。而作为“最尖端艺术的美国电影”，“以前用以麻醉现象的“香艳”、“肉感”、“缠绵”、“醇酒”、“美人”、大腿、“红唇”……等，道路行不通了。不得不转入这样“一条新的歧路”。这样的影片，除了使人们“看到一些奇特的异国风光，开一开眼界之外，是一无足取的”。作者最后怀着悲愤地心情说：“去年，正是沪战紧张的时候，我抱了一颗沉重的心在巴黎的许多碧眼蓄发的白人中间看了这个片子，这时，平津动摇的今日，我又在几乎是荒漠的开封许多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间，抱着同样沉重的心，看了这片子的第二次。我但愿我们不要做了《人兽奇观》中的角色！”

这篇评论，当时在中国，在开封 是很能代表一部分爱国的有识之士的心情和观点的。不但是对当时美国以及其他泊来影片，雾烟障气地充斥着开封银幕的第一次猛烈冲击，也是对帝国主义种族歧视，侵略扩张，奴役殖民地人民的第一次深刻揭露。对于启发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认识帝国主义本质，奋起斗争，起到积极地影响作用。

教育界的担忧

早在1930年，电影尚未大规模普及开来，开封影院只有、

真明、平安、世界、平民、中州 五家。因为1930年7月世界被火烧以后，受其影响又停闭了三家，全市仅剩真明和平安，且条件简陋。每天映出日夜两场，后日场停映，只有夜场，平均每天观众约二千余人。这些观众，通常是“男子没有女子多，女子没有孩子多”。

重要的是这时期上映的影片，皆无声故事片，诸如《火烧红莲寺》、《西游记》、《济公活佛》、《关东大侠》、《双剑侠》、《剑峰侠》、《女侠红蝴蝶》、《黑女侠》、《侠女救主》、《红侠》、《侠义律师》、《山东响马》、《小霸王张冲》、《英雄打虎》、《水上英雄》、《火里英雄》等等，宣扬的是侠客、盗贼、土匪、妖邪、神怪之类。

三十年代初，国民党的各级教育机关，虽然开展了电化教育。后来又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但所提倡的却是什么“救贫致富”，“起弱图强”，宗旨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东西。各影片公司以及各家电影院，对影片优劣，往往以票房价值为衡量标准，只要能赚钱就可以不顾一切的拍摄，放映有许多影片，正象江湖上卖的大力丸一样，只要有人买，治病与否，是无关紧要的。而作为一部份不觉悟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正象吸食鸦片一样，只要一时痛快，致于后来所产生的功效，也就很少去管它了。因而上述这些影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颇能受到欢迎。

这些影片，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效果，这在开封首先引起了教育界的警觉。1930年，署名徐结昌的人。在《河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题为《对于开封电影院之我见》的长

篇文章，对电影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界对电影应负的指导责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历来偏重书本知识，关住门窗做学问，咬文嚼字，在古纸堆里讨论生活，很少注意实际方面的东西。而西方发达的国家，都是以教育作工具，“去改造个人和社会以满足人类的正当欲望，而我们完全是瞎碰乱干，误认为目的，不知教育乃是达到目的一种最有把握最经济的一种手段。”对于电影，不能只“认为是新鲜时髦的娱乐品”，应该从教育的立场去观察，它只能是“社会上感人最深刻最普遍，影响最大，最有势力的东西”，并有着“潜移默化，改风易俗的功用。”

接着，作者对开封的电影事业提出批评，说各影院上映的影片，不顾社会效果，“专以投机营业为目的的去糊干”，如此下去，“不出数年，社会定然要造出一些盗窃，奸杀的奇案来。”下边作者列举了几起青少年看过电影后，受其影响，模仿电影里人物去作恶而犯罪的事实。由此，作者指出，“电影是民众精神上的面色，好象物质生活上吃饭一样的重要！并且是社会教育的良好工具，能引起民众社会的意识，造成民众心理的建设和供给民众精神上的享乐……”而决不能只是为“迎合下流社会一般心理投机营业的东西！”面对开封电影的现实状况，教育界如果袖手旁观，任其发展。课堂上的教育，是难以敌得过社会上电影的影响的。作者呼吁教育界，对电影在社会上的影响，“绝不能轻轻放过，装聋作哑”。

文章最后向开封电影院提出：

在电影放映的时候，应有人指导，“免得引起观众误入歧途”；同时各院应联合起来组织电影讨论会，“切实的共同研究应兴应革

的各种事项。”

由于电影商品化的竞争，一部份人的“投机营业”，不顾社会效果，所造成的恶果，在开封教育界，日渐引起多数人的不满，尤其是那些经受民族苦难，认清了现实的知识分子，对开封电影状况，反映更为强烈。而对于好的影院和影片，如1933年10月10日开幕的大陆电影院，以普及民众教育为宗旨，在影片选择上，一般比较慎重，注意社会影响。开幕式首映了蔡楚生编导的《都会的早晨》，随之在《河南晚报》上举行了专题的《银幕座谈》，对影片内容作了充分肯定与宣传，是受欢迎的。

这一切都表明，利用内容健康的电影，普及社会教育，提高人民群众觉悟，开封教育界作出过一定努力，获得良好效果。

抗战后的失望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国内关系都起了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欢心鼓舞，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能缔造出一个民主，和平的新国家。这时因为战争胜利刚结束，全国各处也确实呈现出一点暂时的“民主”和“朝气”来，如进步剧目《升官图》在开封顺利上映，就是在这胜利后短暂的“民主”时期。

抗战后的河南，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更强贫困，尤其是偏僻的县城农村，勿说电影，即便是收音机，也极其少见，有许多人终身未见过电影银幕和收音机，长期处在与外界隔绝的境地，真可谓

城乡相距咫尺，犹若天壤之别。

面对这贫困落后的现实，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代表着最大多数人的意愿，在《中国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希望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动员起来，为着和平，民主的国家，建设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民主文化；“戏剧电影工作者，应当下乡，深入民间，发挥启蒙与教育的作用，不能只蹲在城市里演戏给一部份有钱有闲的观众看”。因为戏剧和电影都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工具，应该发展到广大民间去为民众服务。文章最后呼吁“一切进步文化的教育工作者们团结合作，迎着新时代、负起新任务，建设新中国的民主文化！”

但是抗战一结束，蒋介石便和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起来，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实行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

对于电影，国民党反动派象篡夺其他抗战胜利果实一样，进行了全面“接管”，并在接管日本人经营过的电影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对电影事业的垄断与霸占机构。从此，中国电影又操纵控制在四大家族手中。开封电影银幕上仍然是凶杀、恐怖、侦探、爱情、心理变态，以及美化国民党特务。鼓吹法西斯思想，诸如《天字第一号》、《忠义之家》等之类的反动影片。

八年抗战胜利了，先进的文化工作者对缔造和平、民主新国家，建设自己民主新文化的希望也梦一样迅速破灭了！这正象《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报导的那样：“《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大华上演，一日三场，场场暴满，足证还是好片子有大量的观众。”但

是，人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上半场都浸沉在抗战初期的兴奋中，散场时又坠入胜利后的失望里。”

批判《武训传》

电影《武训传》，描写的是封建时代一个真实人物，靠行乞所得的钱，用来兴办“义学”的故事。

影片在全国发行以后，引起不同反响。1951年5月30日，《河南日报》第四版发表读者来信，题目是《建议广泛讨论“武训传”开展文学艺术界的批判》。来信指出，“武训事实上是依靠地主、士绅们的支持来办‘义学’的”，“这个‘义学’也只有为地主阶级服务，为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与训练奴才而服务！”

5月31日，《河南日报》第三版转载了北京人民日报丁曼公的署名文章《武训的真面目》，副题《评“武训传”影片、武训及孙瑜先生的检讨》，对编者孙瑜的世界观提出批评。

1951年6月5日，《河南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上谢兴尧写的一篇《武训其人其事》的文章，介绍了武训的全部历史。为批判武训这个人物，提供了资料。

6月6日，《河南日报》第三版转载了〔新华社四日电〕发表的，中央教育部指示各教育机关学校，关于开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讨论与批判的全文精神。中央教育部指示说：“由电影《武训传》所引起的思想斗争，目前已逐渐开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所谓‘武训精神’，在教育工作中，影响极深也极

普遍。这种影响模糊了革命的立场、观点，成为人民教育事业前进的严重的思想障碍”。

6月7日，《河南日报》第四版发表了署名梁建堂的读报笔记《武训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武训其人其事进行了批判。

6月10日，《河南日报》第四版刊载了冯纪汉的长篇文章，题目为《反对同情武训》，文章开首介绍了开封教育界尊崇武训的情况：1946年10月，开封教育当局从西面武训教育协会运来百余幅“武训画传”，在开封市党部展览，收费一百多万元，同年11月还正式成立了“武训小学”；1947年元月由河南省政府秘书马凌甫赞助，教育厅帮助，在开封成立了“河南武训教育协会”，同时画了两套大型“武训画传”在开封长期展览；后又办了“武训慈幼院”。文章接下来，注重对“武训精神”在开封的影响，提出严厉地批判。

6月12日，《河南日报》第四版转载了胡绳的长篇文章，题为《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用历史和现实辩证的观点，对电影《武训传》作了全面地批判，指出电影《武训传》的错误，就在于“把在中国封建制度开始崩溃时代的一个可卑可耻的渺不足道的小人物，捧到了神圣的殿坛上去”。

随后，《河南日报》设《关于武训问题讨论》专栏，刊载一系列文章，对武训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开封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影评活动。

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1967年5月26日。

《开封日报》第一版转载了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的摘录，对电影《武训传》重新提出批判。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的摘录原文附后：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

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的摘录。（新华社北京二十五日电）

批判资产阶级

对一部电影思想内容好坏的评价，多因历史背景不同而各异。少有永恒的结论。

1951年末开封几家影院上映故事片《关连长》，12月5日《河南日报》发表署名周梅鼎的评论文章，《评电影“关连长”》。

认为影片“以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代替了革命的人道主义，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描写成粗鲁愚蠢到处逗人可笑的人物。”并引用了主人公关连长的对白，当人问起他母亲年龄时，他回答说：“操他奶，不知是七十还是八十……”，因此，文章批评作者，“这部影片是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观点写出来的。”在影片中严重地“歪曲了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形象。”社会效果产生很坏的影响。

1965年，国内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同年7月，开封上映故事片《林家铺子》（原著：茅盾，改编：夏衍，导演：水华），供观众批判。开封市文化局、文联、《支部生活》编辑部、《开封日报》社联合，组织群众对影片开展批判，邀请部分老工人、老店员、干部、技术人员举行座谈。是年7月4日，《开封日报》第三版全版，在《影片“林家铺子”是一株大毒草》的统栏标题下，发表了座谈纪要，认为影片是“美化了资产阶级，鼓吹劳资合作，散布合二为一的谬论，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内容极为反动”的大毒草，提醒广大工人，“不要上林老板的当”。

若干年后，影片又重新上映，获得好评。

1965年8月，故事片《不夜城》上映。《开封日报》第三版设《电影“不夜城”必须批判》专栏；开封市文化局、工人文化宫和部分工厂党组织，分别召开职工座谈会。对影片开展批判。8月14日《开封日报》专栏发了署名文章；8月18日又发表了职工座谈纪要。一致认为《不夜城》是一部“美化资产阶级、宣扬阶

级调和论的坏影片”。是通过渲染资产阶级“花天酒地的生活”对现实青年的诱惑与腐蚀。

横扫银幕

1966年4月11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批坏影片的通知》。4月25日河南省文化局签发了《关于上演和批判“兵临城下”等七部坏影片的通知》。这七部影片是：

1. 《兵临城下》（长影厂出品）

2. 《舞台姐妹》（天马厂出品）

3. 《逆风千里》（珠影厂出品）

4. 《桃花扇》（西影厂出品）

5. 《球迷》（天马厂出品）

6. 《两家人》（长影厂出品）

7. 《阿诗玛》（海燕厂出品）

通知中说：“为了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对一些坏影片，必须加以严肃的批判”。并安排了映出顺序、映出时间、映出影院、看片范围、注意事项等。在看片范围中规定郑州、开封、洛阳三市开展轮流放映，以“机关、团体、部队以及高中以上的学校”为主要观众，组织集体包场，售一定另票。通知中还规定，这些影片上映时只登一般广告，不能张贴海报、剧照以及其他影片宣传品。在影片上映时期，为“警惕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请公安部门配合”进行保卫。影片上